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民族史译文集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
一九八五年

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

〔苏联〕Θ·B·沙夫库诺夫

林树山 译 蔡曼华 姚 凤 校

目 录

绪 论	(10) 页
第一章 渤海的先世——挹娄和靺鞨诸部落	(19) 页
第二章 渤海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历史	(41) 页
第三章 渤海国的领土、居民和行政体制	
居民的生业和社会经济状况	(48) 页
第四章 滨海边区的渤海文化遗存	(59) 页
第五章 满洲的渤海文化遗存	(74) 页
结 语	(85) 页

〔译者按〕苏联1968年于列宁格勒出版的《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一书，是近年来苏联史学界研究我国渤海史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对了解苏联研究渤海的全部过程、现状、目的、观点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Θ·B·沙夫库诺夫，是苏联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汉学家，是苏联东方学家H·B·丘涅尔（1877—1955年）的得意门生，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是专门研究渤海与女真的重要学者。据不完全统计，该氏自1955年以来，先后撰写渤海专著与论文（包括苏联科学院存档手稿）达数十部（篇）之多，深得已故A·Π·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1908—1981年）的赏识。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前有绪论，后有结语，正文五章。书中插图八幅，

*本译文曾得到顾铭学、林沅、方起东和刘凤翥等同志的各种帮助，译者谨致谢意。

11/219/18

目 录

渤海考.....〔日〕津田左右吉 著 邢玉林 译 (1)

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

.....〔苏〕Э. В. 沙夫库诺夫 著

林树山 译 蔡曼华 姚凤 校 (9)

渤海史.....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

严圣钦 译 祁庆富 校 (101)

渤海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南朝鲜〕李万烈 著 黄有福 译 (190)

夫余考.....〔日〕池内宏 著 王建 译 刘凤翥 校 (195)

勿吉考.....〔日〕津田左右吉 著 邢玉林 译 (207)

附录：关于夫余城

高句丽的南北道和南苏、木底

.....〔日〕今西春秋 著

高洁 等译 刘世哲 顾铭学 校 (217)

安东都护府考.....〔日〕津田左右吉 著 邢玉林 译 (227)

附录：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新城、木底城及南苏城

二、关于横山、银城及《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

第 14 期目录预告..... (194)

渤海考

〔日〕津田左右吉 著

邢玉林 译

一、唐初渤海的情况

在考察渤海前，必须了解唐初靺鞨的状况。在《隋书·靺鞨传》记载的靺鞨七部中，只有粟末、白山二部的形势多少能够有所了解。有关粟末部，笔者在《勿吉考》一文末，曾有如下叙述：该部抗敌高句丽，其一部分之首长度地稽，炀帝时率众降隋。据《旧唐书·靺鞨传》，度地稽（突地稽）部落被安置在营州，唐初用燕州名并受到羁縻，后来迁至幽州（据该书地理志燕州条，迁移的时间是武德六年）。据地理志，在粟末靺鞨的降唐部落中，保全州名并被安置在营州附近的有慎州的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从黎州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也有乌素固三字看，也是粟末之一部。浮渝，当是“扶余”的异写（在呼伦泊西南方的室韦部落中也有乌素固部，两者大概有关系）。有关处于粟末本土上者，唐初一无所闻。《册府元龟》中有武德贞观时靺鞨累次朝贡的记载，此靺鞨从《勿吉考》一文末所叙述的情况推测，大概也属粟末部。还有，《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武德五年，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但此燕州与上述的度地稽部落无关，此称是另外附加于靺鞨地的阿固郎部落的。因此，阿固郎也属靺鞨部（据《册府元龟》，贞观年间，黑水靺鞨的朝贡只有贞观五年一次，阿固郎于武德五年及九年来朝而未记为黑水；《新唐书》本传中虽冠以黑水靺鞨名，但系泛指整个靺鞨。因此，阿固郎不属黑水靺鞨）。其次，白山部是《隋书》记载的所谓“胜兵并不过三千”的诸部之一，其势力较粟末部稍弱。《旧唐书》记载：“白山部，素附与高丽，因收平壤之役，部众多入中国”；《新唐书》也有相同的记载。据此看，白山部应隶属于高句丽。这种关系，自隋代或自魏代就已形成了。隋唐与高句丽战役期间，在参加丽军的靺鞨中，白山部似乎居多。高句丽灭亡后，此部入唐，唐依例将其安置在营州或营州附近。《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安置靺鞨愁思岭部落的夷宾州隶属营州。但该部落是否属于白山部不明。附加州名与否，根据部民的状况及降服的情形而定，但对降服的靺鞨人则并非全部如此。关于其他五部，唐人拥有的知识十分有限。如上所述，黑水靺鞨仅在贞观中有一次朝贡，其他诸部则没有这种形迹。《旧唐书·靺鞨传》记载：“汨咄、安居骨、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此句“室”字前似遗“号”字），在唐的势力及于辽东方面以后，对于见于古记载的此等部落名不能多有耳闻，而同一地方的部落因有另外的、新的名称而

为唐所知（此拟后述）。《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的部族及其位置，与《隋书》中的文字及方位记载稍有不同，并缺号室部。据此看来，前者不是采自《隋书》。如果从两书都把黑水部放在安居骨（安车骨）西北而致误来看，似乎又可能是出自同一资料而经过某些转讹。号室部的遗脱当是偶然的，因为被《旧唐书》采用的资料从文字上推测应与《新唐书》一致。此处应保留号室部之名。另外，《旧唐书》中有关风俗的记载，是以开元年间经略黑水靺鞨时所获得的知识为基础的。

二、祚荣的根据地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而《新唐书》在记述李尽忠之变后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遁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翻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夷遁去，楷固穷蹙，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新、旧两书有如此不同，而据池内宏氏考证^①，乞乞仲象与祚荣是同一人，一是其本名，一是后改的仿中国式之名。为求真象，笔者就其所据地域，将新、旧两书作一比较。

新、旧两书皆记载，乞乞仲象离开营州后，一度居于某地，李楷固进行征讨后，再移某地。然《旧唐书》并未指出其初据的位置，《新唐书》则指出其位置在太白山东北的奥娄河附近。又，《旧唐书》记载，击退度天门岭的李楷固军后，移向东方，占据桂娄之东牟山；《新唐书》则记载，从最初的居城遁去后，抗拒度天门岭来迫的李楷固，没有说此时定居何处。《新唐书》有关李楷固征讨的记事（除有关乞乞仲象一事外），几乎照搬《旧唐书》，它没有指出祚荣的最后居所。可以推测，除了本传开头的“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的记载外，都出自《旧唐书》或与之相同的资料。在章首中诸如直营州东二千里以及渤海四至的这些记载，可能取自其他资料。祚荣的最后居所，如《旧唐书》所明示，当为东牟山。《新唐书》采用了《旧唐书》所没有的资料，把祚荣（乞乞仲象）的最初的居所作太白山的东北奥娄河附近，而此地果真是最初的居所则大有疑问。如果它是最初的居所，那么当李楷固来讨之时，祚荣就一定再从此地向远方“引残夷遁去”，而李楷固也不能不从此地再越天门岭追蹙之。天门岭在何处不明。在《通鉴》卷210开元元年条中，此记事注有：“新书，天门岭在土护真河北三百里”，其出处不明，难以轻率从之（所谓“新书”，即《新唐书》，但笔者尚未发现此书有上述记载，不知注之

所云有何根据和准确的出处)。只从李楷固是契丹人看,便可以想象他是从契丹方面进兵的,因此天门岭在土护真水即老哈河之北的说法似属可信,而靺鞨人祚荣定居于此地的说法却是值得怀疑的,也许度天门岭是在李楷固伐契丹余党之时,其与征讨祚荣的时间不同,记载上把两者混淆了。据上引池内的说法,伐契丹余党是从神功元年至久视元年(圣历三年)李尽忠灭、楷固降,计有三年时间。而且据《旧唐书·渤海传》,祚荣称振国王时是在圣历中;据《新唐书·渤海传》,楷固的征讨是在祚荣称王号前。因此楷固伐契丹余党前必征过祚荣。称祚荣是契丹余党,颇难理解。又据《渤海传》,征祚荣时,楷固败还,在《狄仁杰传》中记载,伐契丹余党时,他因功最而受到赏赐。从以上记载可以推测,楷固的征讨当有两次。天门岭的位置以及楷固孤军远侵长白山方面均难以考证。在当时的形势下,远征恐怕是不可能的。因此,说祚荣的最初居地在长白山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祚荣某时居于此地也是事实,对这种事实的记载,《新唐书》的编者大概作为资料存留了。由于在运用资料和行文时漫不经心地缀连,所以误认为长白山是祚荣的最初的居城。那么,祚荣究竟何时居于此地?从其地被明确记载看,它并不是临时性的逗留地,到了汉人知道了它是永久的根据地,似乎才知道它是祚荣的最后居城,即可推测在长白山的东北、奥娄河附近的东牟山。

这里有一疑问。《旧唐书》记载,东牟山在桂娄,但所谓桂娄是见于《魏志·高丽传》的五部之一,其位置在当时的都城丸都(国内城)地方,此语照字面解释,则东牟山必在古丸都即今洞沟附近。然而,不能认为桂娄是对上代的高丽人的特殊称呼而到了后代是用来作同一地方的地名的。此五部之名,不过是丸都为都城时,以其为中心的四周的称呼,本不是地名,首府移到平壤后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至唐代,很难相信汉族人把此语当作地名。据史载,中国人从历次战役中熟知了国内城名并且一直沿用下来(《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灭亡后,唐对其故地的设施。其中说:“高丽国,旧分为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此“旧分为五部”,恐怕只是草率地袭用了古史的记载罢了。实际上,在当时并不是这样区分的,其名不是在以丸都作为王城的时代形成的。到高句丽灭亡时,也用桂娄名,或许唐人也有此闻。如果是这样,当时的桂娄部指平壤地方,它作为东牟山的所在地一定会被发现)。因此,“桂娄之东牟山”一句,是指祚荣时代的居城,不可能传到唐人中间。《册府元龟》卷956:“渤海靺鞨大祚荣本高丽别种也,唐开元中高丽灭,祚荣家属,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此句见于采用诸史中的各部族概况而编纂的《外臣部总序》,并非根据官方的确切记载,而“开元中高丽灭”又是明显的舛错,因此不足为凭(同书卷1000还记载:“渤海国王武艺本高丽之别种也,其父祚荣东保桂娄之地,自立为振国王,以武艺为桂娄郡王”,此出处同上引文)。这样的记载,盖出《旧唐书》、《册府元龟》或其史料的主笔的些许误解,是由于把祚荣之子武艺称作桂娄郡王造成的。而这种称号是否如上引《册府元龟》所载,是祚荣授予的呢?同书记载,开元七年武艺袭父位时,唐对他同对祚荣一样,册封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寻将其嫡男大都利行封为桂娄郡王。由此可知,武艺也是受唐册封的。假如他的称号是其父祚荣给的,唐是决不会承认的。所以这个称号不是后来沿袭的。这种称号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但却不表示实际领土或居城,例如,把奚酋长可度者作楼烦县公、高丽王的后裔作安东都督并相当于朝鲜郡王,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如果祚荣本人被册封为渤海郡王,那么授予桂娄郡王称号

的武艺就不可能居于古桂娄地。唐朝甚至连桂娄在何地都未加思索，只不过根据渤海有高丽故地便不由地借用了《魏志·高丽传》中的文字。而且，据《旧唐书》，祚荣初受唐册封是在玄宗的先天二年，其称号正如后述，是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其都城可以推测为忽汗水即今瑚尔喀河流域，而其子武艺被封为桂娄郡王至少是在此时，而此时他还在王都。所以，所授武艺的桂娄郡王名与实际的居城并无联系。《旧唐书》及《册府元龟》冠桂娄二字于东牟山只不过是无意之中加上了无意义的文字，否则就很难解释了（在《新唐书》中，凡有挹娄之处均称其在太白山北之东牟山，可见似有察觉。但当时还没有用挹娄名，必是把桂娄作了更改）。因此，不应当根据此文字认为东牟山在国内城附近。

现再作一推测。祚荣之所以离开营州入契丹，不久又来到遥远的东方，是有某种缘故的。此地想必是如《勿吉考》一文所述，属《隋书》中记载的所谓长白山部，祚荣来太白山东北筑居城是因为此地是他的故乡，他属白山部靺鞨。当然，这些只不过是推测。随着高丽的灭亡，白山部靺鞨入唐，唐依例将这种夷民置于营州。据此看来，祚荣初属高丽，后居营州，是因为他属于白山部的靺鞨。而从高句丽遗民未被置于营州，也可以推知他是靺鞨而不是高句丽人。《旧唐书》所以称之为“高丽别种”，是因役隶高丽，随着高丽的灭亡而降唐，从而亦暗示其属于白山部（虽然“别种”一词从中国史籍的语法习惯上说是指塞外民族的由来，并且大半是杜撰的，不必拘泥于此，但这样的解释则是恰到好处。另外，《新唐书·渤海传》中的“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这种解释是否可信，令人怀疑。同传中还有舍利乞乞仲象，在地理志中记载的安东都护府的属州中有舍利州，如认为舍利是靺鞨部落名，则难以断言乞乞仲象的故乡是此舍利州，而且也不知道其位置）。

那么，东牟山的位置如何？如果对东牟山和奥娄河其名一无所知，那就必须从其他方面入手加以探讨。

三、渤海的首府

首先探索祚荣都城的确切地点。

按《旧唐书》：“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新唐书》的记载与之相同），从祚荣有忽汗都督之称、其国为忽汗州看，其城可以推测为忽汗水（瑚尔喀河）流域。

《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其中所谓“旧国”，当然是祚荣以来的王城。在忽汗河流域之忽汗河东有天宝以后的王都上京，距上京三百里的西方即是祚荣的王城地。贾耽的《道理记》记载：“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把“天宝中王所都”与上引《新唐书》记载的“天宝中钦茂徙上京”对照，则显州即《新唐书·渤海传》所称的“旧国”，而“旧国”是祚荣建国之时所定的王城之地。但《道理记》中说此地与天宝以后的渤海王城即忽汗河畔的上京相距六百里，因而与《新唐书》的记事发生齟齬，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应如何解释呢？

据《渤海传》，显州属中京显德府。中京的位置不明。按五京的配置说，上京龙泉府位于毕尔腾湖附近的瑚尔喀河东岸，即今东京城之地，这已成定论^②。西京鸭绿府，应从在鸭绿江上游的帽儿山附近之说^③。东京龙原府及南京南海府，当在自豆满江下游至朝鲜咸镜道方面的某处，其具体位置难以断定。据此可以推知，通常所说的“五京”，不是把渤海的全部领域划分成五部并分配在各要冲。因为五京是渤海的中心地区，所以它是把建国的根基地区分成五个方面并置于其要冲。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即：比长岭府、扶余府等渤海扩张的领土占更重要位置的诸府或涑沫江畔的涑州等，都不属于五京中的任何一京。从此点和从其名称看，在四京之间并称作中京的显德府，大体上可以推测在鸭绿府东、南海府北、龙原府西、龙井府南。而此地比定为瑚尔喀上游或松花江东方的支流富尔虎河附近较为妥当。称作旧都的显州，如果如上所述，是中京显德府的治所，并且先天及开元中祚荣及武艺被册封为忽汗州都督也是事实，则可以妥当地推测天宝中的都城也在忽汗水流域。因此，显州应在瑚尔喀河上游。《吉林通志》拟中京为今敦化县附近是非常正确的，这也与《道理记》中的自神州陆行四百里的记载并不矛盾。虽然把显州作为中京显德府的治所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以把名称类似的显德府中的中京名暗示成旧王都为根据的，但是限于缺乏资料，这样的假设亦无可。也许有人认为敦化县附近地域狭小，不足以具备作为一国都城的条件，但实际上，其地恰处山间，附近有物产丰富的瑚尔喀河、富尔哈图河、海兰河等诸水域，又有四出经略之便，作为都城自然是适当的。同时，其山间险岳，也非常利于防守。因此，置都城于该地是毫不奇怪的。据《渤海传》，中京的属州有六，与上京及南京的各三州、东京及西京的各四州相比，其数颇多，因此中京的辖域比其他四京更广。也可以说，这个地区分布于出自松花江东的诸支流及富尔哈图河的上游。而且，如果对称作涑州的土著部落只是附加了这样的名称而已，那么根据其地势，小部落以相隔不等的距离而存在的地方，必是不大的地区，并且应有众多的州数。所以决不能按州数推测地域的广狭。根据以上事实，中京无疑是在敦化县附近。这样，就与《渤海传》中记载的天宝前的王都在上京的即今东京城的西方三百里处相吻合。显然，《道理记》所记其间的距离六百里，是计算多了。

先天、开元、天宝间的渤海郡王都位于瑚尔喀河上游的敦化县附近，则东牟山也确实在此地。如上所述，太白山的东北有东牟山，此与敦化县在太白山的东北方相符合。据贾耽的《道理记》，从营州经襄平至忽汗海的渤海王城，距离是二千一百八十里；《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东牟山在营州东二千里。对照以上两种记载，则知东牟山位于自忽汗海的上京仅一百八十里的西南。《渤海传》作二千里是夸大，测量有失精确。这个里数，与旧国和上京两地的距离为三百里，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似不妨把东牟山称为天宝以前的所谓旧国。

在已经确知渤海建国时的都城所在后，下面进一步考察该国的领土及其发展趋势。

四、渤海的领土

渤海的领土所及其扩张的途径如何？史籍鲜有记载，难以确知。但综合片断史料也可以推知其大概。

据《旧唐书·渤海传》，祚荣开元七年歿，武艺袭其后。据《续日本纪》，神龟四年（开元十五年）渤海使节来我国。从使节横渡日本海而来看，此时的豆满江下游及咸镜道方面大概已划入渤海。从东牟山的居城经过布尔哈图河流域到达豆满江下游是很容易的，说该地方自建国之初便属于渤海所有亦无不可。祚荣招致高句丽遗民而用之，即如本传记载：“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派遣使节到我国一事，无疑是根据高句丽人的筹画。因此，续纪记载的使节来朝条“渤海郡古高丽国也”一句，应是使节所言。于是，以后来朝的使人多冒称高氏。渤海的文化那样发达，是他们直接向唐学习的结果，而多年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高句丽遗民固有素质的形成，也是不容忽视的。根据这些事实考察，曾经隶属于高句丽的白山部靺鞨及作为高句丽领土的咸镜道一带早就属于渤海了，这种形势是很自然的。东京的别名栅城府，肯定是沿袭了《魏书·高句丽传》中称作其东境的栅城府的旧名。在南方，何时与新罗来往不明。如果开元二十一年（新罗圣德王三十二年）唐把新罗作为渤海的南鄙加以攻击是事实的话，那么此时两国已经于泉井郡之北接壤了。

渤海利用高句丽人的情况已如上述，而经略鸭绿江一带不需要化费很长的时间。从开元二十一年攻击登州看，当时的势力已经及于江口附近，贾耽的《道理记》记载泊沟城为渤海境，就是这时候的情形。从营州被契丹攻陷至唐自然而然地放弃辽东的大部分，渤海括有鸭绿江一带是最容易的也是必然的趋势，西京鸭绿府就是管治这一带的，而在所属的神桓丰正四州中，至少神桓丰三州在鸭绿江和佟家江流域（神州即辽的涿州，今临江府、桓州是高句丽时代的丸都，应是今洞沟^④）。

多少有些疑义的是太子河上游及浑河流域。据《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唐乾元元年）渤海的使节有木底州刺史杨承庆，翌年，玄菟州刺史高南申来朝。如木底州是古木底城，当在今太子河上游；如玄菟州是玄菟郡故地，当在今奉天附近^⑤。正如《续纪》所表明的，这些地方均划归渤海。《新唐书·渤海传》：“长岭府营州道也”，此地大概在今辉发河流域。由于长岭府的管区有限，所以此府的属州只有瑕、河二州。据此看来，把浑河流域列入渤海领土似稍有疑问。圣历年间废除设在新城的安东都护府，从此这一带无疑摆脱了唐的羁绊。而新城中有高丽遗民，他们和渤海的关系如此密切，这可以大致说明自开元、天宝至乾元元年之间，这一带便为渤海所有了。《渤海传》中没有比拟于此地的府或州，其所以如此，必是在这里还有行政区划时就由于有某种缘故而失传了。襄平地方，天宝时为营州所辖；金州方面仍是唐的领土。因此，渤海的领土即使在最广的时候也只限于这些地区。如果长岭府为营州道，参照贾耽的《道理记》，它当是自忽汗海的王城、经过古新城地到达营州的交通要冲。此道当自辉发河流域至浑河流域^⑥。长岭因处于此二水域之间的分水岭得名，以此命名的渤海府城如果在其东方，则长岭府便在辉发河流域。《辽史·太祖本纪》天显元年三月条记载讨灭渤海国后的经略，其中说：“遣夷离毕康默记、左仆射韩延徽攻长岭府”，八月“康默记等攻下长岭府”，同书卷74《韩延徽传》记载：“与康默记攻长岭府，拔之。师还，太祖崩，哀动左右”。根据这些记载，为了经略长岭府一带而在三月被派遣的康默记、韩延徽，到了八月（太祖崩的翌月）才平定长岭府。同书卷74《康默记传》：“与韩延徽下长岭府。军还，已下城邑多叛，默记与阿古只平之。既破回跋城，归营”，同书卷73《阿古只传》：“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起。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所向披靡，会贼游骑七

千自鸭绿府来援，势张甚。阿古只帅麾下精锐，直犯其锋，一战克之，斩馘三千余，遂进军破回跋城”。可见，第一次降服之地有回跋城，之后因复叛，康默记等再次进兵攻陷之。回跋，《辽史·营卫志》部族章作回跋部，是辽国外十部之一；《辽史拾遗》中的《北风扬沙录》作回霸，是既非生女真又非熟女真的女真部落名。如果“回霸”二字今以“辉发”写，则可推知此城在辉发河流域。这样，此城便在长岭府内。回跋是当地人的俗称，它与正式的名称长岭府并用是不足怪的。从渤海人的习惯看，如果长岭府之外还有另外的回跋城，则其名应当多少仿照中国式，而这样的名称不见于史，这正表明回跋城在长岭府。而如果辉发河畔有这样的府城，其地拟为今山城子是最恰当的了。

西境是今农安附近的扶余府，建国后不久，其地与粟末水流域共归渤海所有^⑦。其次，有关北境需要作一些考证。据《册府元龟》，拂涅、越喜、铁利等靺鞨部落，自开元二年始累次朝贡于唐；十年，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来朝，被授予勃利州刺史。又，《旧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此时唐置黑水府，派长史管理其诸部落。《新唐书·渤海传》：“有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册府元龟》卷956记载振国（渤海）的境地“西接越喜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又《旧唐书·靺鞨传》记载，黑水部向唐朝贡时渤海王武艺说：“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从以上记载看，开元年间渤海的领土，在北方及西方接黑水、铁利、越喜、拂涅等靺鞨诸部（黑水靺鞨在贞观年间一度使聘于唐，其后交通阻绝。从开元年间开始频繁朝贡。如果越喜、铁利、拂涅等此时开始朝贡，则见于新旧唐书的有关这些部落的知识无疑是在开元年间获得的）。如果拂涅在拉林河下游附近^⑧，则越喜、铁利、虞娄等也是与它接近的部落，应在自阿勒楚喀河地方延伸到其东方的松花江的南岸，大概就在前代便有所闻的安车骨、号室等诸部落地^⑨。另外，黑水靺鞨的西部，估计达到三姓方面的松花江南岸，箭内氏认为唐置的黑水府可能在三姓附近^⑩。这一时期，渤海的北境大体上在以今农安北的松花江为西端、以宁古塔和三姓中间的地区为东端的中间所划的一条线上。拉林河下游、阿勒楚喀河流域和三姓地方，还没有划入渤海。上面所说的那些部落自开元初突然相率向唐朝贡，必有缘故。渤海势力强大，而朝贡是这些部落为避免渤海的压迫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渤海王武艺听到黑水部朝贡大怒：“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据此也可以看出，此后渤海逐渐对这些部落施加压力，而据《册府元龟》，天宝以后，拂涅、越喜、铁利诸部落一概断绝朝贡（贞元年间越喜朝贡一次）。据此可以看到渤海的形势。东平府（拂涅故地）、铁利府（铁利故地）、怀远府（越喜故地）都是在这种形势下设立的。这些地区划入渤海，当在钦茂王时代（开元、贞元之间）。见于《渤海传》的府名，有定理、安边、率宾、郑颢、安元等。定理府如是挹娄故地，当在今宁古塔地方。率宾府，松井氏已经考定，在绥芬河畔^⑪。安边府虽不详，但从其名记载于定理、率宾之间看，可能在北方的边境，抑或在定理府之北、瑚尔喀河下游。黑水靺鞨（的西南部）是否属于渤海难以确知，因此这一带的北境不明^⑫。另外，郑颢府，根据其名假若在勿吉故地，则可能在以扶余府隔开松花江的东北方。如果郑颢府在扶余府后、定理府前这种记载顺序暗示着位置，那么郑颢府似在拉林河上游的五常厅附近。从拉林河下游流经东方的松花江的南岸一带是拂涅、铁利、越喜的故地，东平、铁利、怀远诸府应在这些地区。而如果这样，郑颢府的位置就只能从上述这些地区以外求之了。《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天显元年正月太祖攻渤海、降忽汗城，此后，郑颢府的官司同安边、南

海、定理诸府官司一同来见，三月，鄯颿、安边、定理三府叛。据此可知，鄯颿府在辽军从扶余向忽汗城进军的通路之外，五常厅附近也与此类似。最后，没有发现可以推测安元府位置的资料。率宾府及安边府属于渤海领土，《新唐书·渤海传》：“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仁秀时代大概是唐的元和、宝历时期。根据《续日本纪》可以推断出初定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名的时期。在乾元年中，还有木底州、玄菟州等名称，宝龟七年（唐太历十一年）来朝的使节从南海吐号浦开船。从这些记事看，初定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名，是在乾元二年以后、太历十一年以前，即钦茂王时代，此后新增加的领土照此例定名。

注 释

- ①《东洋学报》，第5卷，第1号。
- ②《满州历史地理》，第1卷，第413页。
- ③同上书，第416页。
- ④同上；同上书，第2卷，第15页。
- ⑤同上书，第1卷，第96页——98页。
- ⑥同上书，第391页。
- ⑦同上书，第1卷，第418页；第2卷，第42页。
- ⑧《勿吉考》，第15页。
- ⑨据《册府元龟》，越喜在西方，只知大致方位，似在沿东流的松花江某地；《新唐书·渤海传》作西方，同拂涅、铁利。据《册府元龟》，拂涅、铁利、越喜的首领相伴朝贡，由此可以推测，他们之间在地理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也诱致黑水靺鞨朝贡。又，开元十二年，达莫娄首领也曾陪伴他们。因此，这些部落应在东流的松花江畔、黑水靺鞨的西方。
- ⑩《满州历史地理》，第2卷，第377页——378页。
- ⑪同上书，第1卷，第418页。
- ⑫《道理记》记载，从忽汗海的渤海王城，北经德里镇，南至黑水靺鞨，计千里。然这是何时的情形不明，而且曰千里显然是夸大。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大历、贞元、元和时，黑水靺鞨也曾朝贡，《册府元龟》所载同一时期的靺鞨朝贡即指此（元和十年，明确记载为黑水）。然而，此黑水靺鞨如果是三姓方面的部族，则此地区似乎还没有划入渤海。很难推断其属于渤海而且又不得不朝贡于唐。从地势上看，渤海最盛时，三姓附近服属渤海。

译自《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

第一册（1915年）。

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

〔苏联〕Э·В·沙夫库诺夫

林树山 译 蔡曼华 姚 凤 校

目 录

绪 论	(10) 页
第一章 渤海的先世——挹娄和靺鞨诸部落	(19) 页
第二章 渤海国的建立及其政治历史	(41) 页
第三章 渤海国的领土、居民和行政体制	
居民的生业和社会经济状况	(48) 页
第四章 滨海边区的渤海文化遗存	(59) 页
第五章 满洲的渤海文化遗存	(74) 页
结 语	(85) 页

〔译者按〕苏联1968年于列宁格勒出版的《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一书，是近年来苏联史学界研究我国渤海史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对了解苏联研究渤海的全部过程、现状、目的、观点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Э·В·沙夫库诺夫，是苏联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汉学家，是苏联东方学家H·В·丘涅尔（1877—1955年）的得意门生，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是专门研究渤海与女真的重要学者。据不完全统计，该氏自1955年以来，先后撰写渤海专著与论文（包括苏联科学院存档手稿）达数十部（篇）之多，深得已故A·П·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1908—1981年）的赏识。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前有绪论，后有结语，正文五章。书中插图八幅，

*本译文曾得到顾铭学、林沅、方起东和刘凤翥等同志的各种帮助，译者谨致谢意。

图版三十六张（略）。全书引用大量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对渤海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进行阐述，对我国东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多有可资参考之处，但书中的某些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例如书的一开头便称：正像汉族人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一样，黄河以北的领土“乃是突厥、蒙古和通格斯—满洲各族的故乡。”作者在书的结语部分又强调指出：“滨海边区的历史是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祖国（苏联）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寥寥数语，足见作者之政治用心。同时，他在“绪论”中还援引沙皇俄国学者B·П·瓦西里耶夫的话说，中国史书的作者们“歪曲历史事实”，“喜欢在纸上侵占那些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等等。

为撰此书，沙氏参阅了国内外一百二十五部（篇）史学文献，然而，该氏对古代汉语不甚了了，以致在转译我国文献史料时，出现了许多误解和臆测。有的地方甚至以讹传讹，酿成大错。译者为此不得不在每章之后附译者注，略加说明。

译文插图复制为王新胜。

绪 论

渤海国的历史（698—926年）与其先世部落靺鞨和挹娄的历史密切相关。这些部落的历史发展道路也是远古时期中央亚细亚和远东各国、各部落联盟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国学者很久以来便对这一部分亚洲大陆的过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里，形象地说，正是古代世界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最大的种族组织的摇篮，这些种族组织为许多民族和部族奠定了基础。

假如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黄河中下游流域及其南部毗邻疆域是汉族的远古发源地，那么就有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黄河以北的领土乃是突厥、蒙古和通格斯—满洲各族的故乡^①。这里发生的一些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不仅在毗邻的亚洲各地，甚至在亚洲以外常常引起强烈的反响。匈奴人西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支洪流一直席卷到亚得里亚海滨。称之为“民族大迁徙”的这次迁移，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衰落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对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都有过极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影响。大约经过一千年，又有大批大批的蒙古人从这里西迁，他们的毁灭性侵袭和征服，给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以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更远的年代，即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正像好些考察家所推测的那样，还是从这里开始，原始人类占居了东北亚的辽阔地域，然后又从这里移居北美和日本列岛^②。

研究渤海及其先期的历史，对于弄清下列这些欠加研究，而在当时却又很重要的问题，诸如渤海国及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与特点，靺鞨—渤海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关

系的性质，渤海及其文化在中央亚细亚东部和远东各国及各民族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等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研究这些或那些历史过程时，某些外国研究者曾推测：渤海国对唐帝国或日本国曾有过某种臣属关系^③。顺便说一下，当时日本国本身尚处于形成过程中。

实际上，正像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渤海是一个既不赖此，也不靠彼的国家，它是当时远东文化、政治历史中的突出现象。

还应顺便指出，根据东亚历史学术知识的现有水平可以断言：渤海国并非是独立于强大唐朝之外的唯一国家。中世纪时期，在东亚南部和西部曾长时间地存在过一些强大的国家组织，如南诏、吐蕃（西藏）、第二东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等等。这些国家曾经如此的有组织和如此的强大，以致多次同它们的强邻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战争，捍卫了自己的独立。

对于那些不正确的认识首先可以这样来解释，即对渤海及其先期的历史直到不久以前还研究得很不够，并且未尝全面阐述过。因而，为了用具体史料充分说明史实，亟需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苏联远东及其毗邻地区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这是显而易见的。

通古斯—满洲各部族的族源问题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对这些民族遥远过去的研究程度。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分析表明，现代的那乃人（НАНАЙЦЫ）、乌耳奇人（УЛЬЧИ）、乌德盖人（УДЭГЕЙЦЫ）、奥罗奇人（ОРОЧИ）、满洲人（МАНЬЧЖУРЫ），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基里亚克人（ГИЛЯКИ），他们的历史都与渤海及其先世部落鞑靼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④。

早在公元一千纪后半期，各鞑靼氏族部落联盟向前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已显现出来。十世纪初，契丹人灭亡渤海并占领其部分领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当时已经以女真一名著称的各鞑靼部落彼此间的隔绝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切不能不导致一些虽属同源、却已完全隔绝了的民族联盟的形成。以这些联盟为核心，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期间内形成了现代的远东通古斯—满洲各族。有鉴于此，很想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史料，在涉及女真人时，总是明显地把他们分成几个大的地方性联盟。在一些场合下，这些联盟均以所在地域的名称出现^⑤。这显然是一些小的区域性部落联盟。在另一些场合下，整个女真部落被分成三大支：北女真、南女真^⑥和东女真^⑦。南女真有时也称西女真。正像文献史料分析所判断的那样，后来从占据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滨海边区领土的北女真人中形成了如下部族，诸如那乃、乌耳奇、奥罗奇和乌德盖人。而从居住在辽东地区、鸭绿江沿岸和松花江上游的南女真人中分出了满洲人。

这样一来，我们便碰到了一种当时斯拉夫诸部落所特有的现象。它们也分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以后由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又由这些人形成了许多同源民族。

今天，在苏联远东领土上，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广泛。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第一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详尽地回答研究者们所面临的有关渤海国历史方面的一些问题。例如，由于最近进行的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在滨海边区首次发现两处极有意义的渤海文化遗存，后来对它们进行了研究。仅以当时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便可以批判地修订此前积累的一些中世纪时期的考古资料。这些成果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滨海边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一些中世纪遗存的断代问题，还可以在某种

程度上澄清远古渤海人以及契丹人和女真人文化的形成途径和特点问题。

在发现滨海地区的渤海文化遗存之前,俄国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地志学家就曾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和考察。

在俄国,对苏联远东南部历史的研究,始于1655年。当时俄国的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发现了特林寺废墟及其附近的几块铭文石碑^⑧。特林遗存的发现和关于它的早期文字记述^⑨以及收录在十七世纪一些文献中的有关阿穆尔河及其支流沿岸古城址的某些记载,早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就在俄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对远东古迹的极大兴趣。而且,当时的一些学者曾试图对这些遗存的来历作出自己的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和假说必然带有其时代的烙印。例如,在С·У·列麦佐夫对特林遗存的来历所作的解释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认为,这些遗存不是别人,正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遗留下来的^⑩。

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它的后半期,出现了著名俄罗斯汉学家Н·Я·比丘林(雅金夫)、В·戈爾斯基和В·П·瓦西里耶夫的一些著作,他们在这些著作中,对滨海边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及其毗邻的外国远东地区的古代和中世纪史作了总的评述。由于这些著作,才第一次有可能科学地阐述我国远东发现的那些古代文化中的考古遗存。

③

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随着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之后是滨海边区的并入俄国,俄国移民开始加强对这些领土的开发,这时人们对历史和考古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与此同时,为了全面研究远东,向这里派遣了许多科学考察队,其成员是一些职业上与历史科学毫不相干的人。这些人也对考古遗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为科学研究保存了一些有关遗存分布地点和原始状态的宝贵资料。在这方面,矿业工程师Н·安诺索夫^⑪和洛帕京^⑫的一些著作尤为珍贵,他们都在滨海边区南部进行过地质勘察。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关于古城址的记述,这些古城的一部分未能保存到现在;还可以见到一些对古矿场的标示,主要是金矿场;甚至还可以见到某些关于考古发现的描述。不仅如此,Н·洛帕京还筹印了一部巨著,其中把滨海边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萨哈林岛的四十九处古代遗存的资料汇集到一起^⑬。这实际上是有关我国远东古代遗存的第一部巨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除了记述一些遗存的分布地点以外,还对一些石雕和建筑物的细部作了素描。这些石雕和建筑是在现今乌苏里斯克市区女真人的一些居址现场发现的。

帕拉季·卡法罗夫当时对滨海边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历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留下了一些极其珍贵的女真史资料,还发表过好些有关考古遗存的报道和记述^⑭。他第一个提出了滨海边区的现有古城都属于渤海人和女真人的见解。诚然,П·卡法罗夫同时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断言,滨海边区的“所谓石器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很晚,即到十一世纪初”^⑮。他的这一主张,后来曾为其他研究人员当作真理而接受,他们借用П·卡法罗夫的威望,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一种当地部落一贯落后的思想。因此,渤海国的建立及其当时的高度文化这一事实本身被他们解释为不是这些部落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从外部引进和强加的国家统治形式的效验,是一些较为发达的邻国影响的结果^⑯。

整个说来,革命前的历史学家和远东地志学家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带有十分不连贯的性质,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偶然从事。对滨海边区考古遗存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

1884年开始的，当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了阿穆尔边区研究会，Ф·Ф·布塞被选为该会的主席。Ф·Ф·布塞与Г·Д·马尔科夫、В·П·马尔加里托夫、П·А·克罗波特金多年合作，实现了对滨海边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考古遗存的系统考察^⑦。Ф·Ф·布塞在自己的著作中首次为滨海边区的古代史作了分期。他把这段历史分为两个大的时代：原始人类时代和中世纪时代。他又把中世纪时代划分为四个时期：1) 渤海国存在时期；2) 女真人的金朝在边区的统治；3) 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4) 满洲人的征讨。

1916年，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出版了一部А·З·费多罗夫的短篇著作——《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及其郊外的古代遗存》。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当时所知的位于乌苏里斯克市郊的所有中世纪遗存都作了描述并绘制成平面图。早些时候，曾有В·К·阿尔谢尼耶夫的一些短篇著作问世。他作为当时的一名军事地形测绘员，对他在滨海边区东海岸发现的大量中世纪古城和设防居址作了考察、记述并绘制成平面图。可惜，В·К·阿尔谢尼耶夫所搜集的有关中世纪遗存的资料至今尚未发表，部分资料作为不完整的手稿现今保存在全苏地理学会滨海边区分会的档案馆中。

В·К·阿尔谢尼耶夫也为滨海边区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作了分期，它由四个时代或时期构成：

- “1) 原始人类时代—石器时期；
- 2) 七世纪前文明满洲部落与当地远古居民的斗争；
- 3) 八—十二世纪的渤海王国；
- 4) 1386年前的金帝国……”。

按照В·К·阿尔谢尼耶夫的观点，在滨海边区根本未曾有过青铜器时代^⑧。

В·К·阿尔谢尼耶夫的分期同样过于概括和简略。不仅如此，即使同Ф·Ф·布塞的分期相比较，该分期也是一大退步。总而言之，无论是В·К·阿尔谢尼耶夫，还是Ф·Ф·布塞，正像П·Н·伊凡尼耶夫对此公正指出的那样，“由于对考古遗存研究得薄弱，都未能提供较为详细而准确的分期”^⑨。

В·К·阿尔谢尼耶夫跟在一些先于他的俄国和外国研究者后面，也认为渤海国的产生仅仅是由于那些比当地靺鞨部落具有更高文化水平的外来部落的影响和干预^⑩。事实上，正如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⑪。它“只能产生在社会分成阶级的地方和时候”^⑫。

总之，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革命前的研究者对滨海边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遥远过去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对业已积累的考古资料的系统和综合做得却很不够。他们的全部活动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对一些古代遗存的披露和描述，而且对这些遗存的断代往往带有十分随意的性质。结果，他们把大多数中世纪遗存误认为渤海时期的遗存。然而，近年来的考察证明，能够纳入渤海时期的遗存，目前只有克拉斯基诺古城和南乌苏里斯克古城的下层。大部分滨海边区的中世纪遗存，均属于较晚的，即十一—十三世纪的遗存。

因此，渤海文化遗存，如果不包括一些个别发现，实际上在革命前无论在滨海边区还是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均不为人们所知。

事实上,对渤海文化遗存和渤海史的研究,仅仅始于苏维埃政权年代。十月革命前,总的来说,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对渤海了解很少。在H·Я·比丘林^②、B·戈尔斯基^③、B·A·帕诺夫^④、Д·М·波兹德涅耶夫^⑤的一些著作中,也只有一些关于渤海的个别史料。

1929年,出版了一部当时最完整的有关渤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该书为远东大学副教授З·Н·马特维耶夫所撰^⑥。在这本书中,他收集并综合了当时他所掌握的全部古代文献史料。但在这部著作中,根本没有考古学资料,因为这类资料当时在研究者手中本来就不存在。在援引古代编年史文献时,З·Н·马特维耶夫在好多地方都译得不够准确,存在遗漏,也没有标明引文出处。尽管有这些不足,З·Н·马特维耶夫的这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是渤海国政治历史方面的一部最完整的俄文著作。

1953年,在渤海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一年组成了苏联科学院远东考古勘察队,著名的古代西伯利亚——远东考察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教授领导了这支勘察队。

由于不懈的探索,早在1955年就在野猪河码头镇(Тетюхе—Пристань)附近发现了第一座渤海古城。然而,由于缺少确切的考古断代资料,便无法认证该古城属于渤海时期,只是提出一种推测:与女真人的遗存相比,该古城的起源更早一些,同时大多数滨海边区的中世纪古城,诸如南乌苏里斯克古城、尼古拉耶夫斯克古城、丘古耶夫斯克古城、萨彦——巴尔斯克古城,都具有双层的特点,其下层被认为属于渤海时期,而上层则被认为属于女真时期^⑦。后来,这种推测只被南乌苏里斯克古城的一些考古资料所证实^⑧。至于上述其他古城的下层,正如1963年的一些考察所证实的那样,从各方面判断,应该属于较晚期,即属于十——十一世纪。

1954年,着手清理南乌苏里斯克古城区域内的渤海层。为此,远东考古勘察队的研究员H·H·扎别莉娜对乌苏里斯克市南部地区的一个丘岗进行了部分发掘。在丘岗下面发现了一些古代建筑物基础的残存。根据在这里发现的两枚“开元通宝”硬币,H·H·扎别莉娜认为该古代建筑属于渤海时期。也是在这里,又找到一枚十一世纪的硬币,还找到一片檐瓦,该瓦带有菱形瓦当,瓦当饰有“花叶纹”^⑨。

本书作者也参加了勘察分队的工作,本人依据目前手头占有的广泛的考古资料得出结论:1954年发掘的遗存,并不像H·H·扎别莉娜在其著作中所断定的那样,属于八——九世纪,而是十二——十三世纪。最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是那片带有菱形瓦当、瓦当饰有“花叶纹”的檐瓦。这种瓦,正如后来的一些考察所证实的那样,只为较晚期所特有,其中,包括十一——十三世纪^⑩,也包括女真时期^⑪。

至于在南乌苏里斯克古城区发掘丘岗时发现的古钱学资料,这里应该指出,女真人由于对宋代中国的长期战争感到钱财匮乏,1127年在虏获中国皇帝钦宗的同时,掠获了他的全部金库,并把掠获来的这些中国硬币发行使用,一直到女真人第一批自制货币发行之后,这些中国硬币仍在继续流通^⑫。在女真人于十一——十二世纪掠获、后来又被他们流通的中国硬币中,含有大量的流行于七——九世纪的“开元通宝”硬币^⑬。

1957年,发表了A·П·奥克拉德尼科夫论日本考古学家发掘渤海上京遗址的文章,上京位于现今中国东北的东京城附近^⑭。在这篇文章中,A·П·奥克拉德尼科夫详细地阐述了日本考古学家对渤海文化遗存的考察成果,并指出了这些考察对研究滨海